

一个梦

□[日]代田智明

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读过鲁迅的文章了。那是因为在日本初中的日语课本里有一篇竹内好翻译的《故乡》。上高中时我又看了一本竹内好翻译的岩波文库图书《呐喊》,加深了对鲁迅的理解。上大学以后,就自己花钱买了一套岩波书店出版的13卷的《鲁迅选集》(1964年修订版)。这是由竹内好、增田涉、冈崎俊夫及小野忍等编辑翻译的当时最有权威性的关于鲁迅作品的《选集》。他们都是从二战前就开始参加中国文学研究会活动的成员。《选集》中除了小说、随笔以外,还包含了评论、杂文、书信和一部分日记等。这些书现在还摆在我卧室里书架的第一排上,每天晚上看护着熟睡的我。学了汉语之后,在阅读鲁迅作品的日文翻译版的同时,我逐渐开始阅读鲁迅著作的中文原著。在我刚开始学汉语的20世纪70年代还不像现在这样,有那么丰富、可信的中日辞典。当时我们老师推荐给我的也不是中日辞典,而是一本小小的袖珍本《新华字典》。

我首次精读的中国小说是巴金的《家》,他的现代汉语很标准,也比较容易理解,而鲁迅的作品却不然,并没有那么简单易懂。当时正值“文革”中,1958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由于“四条汉子文艺黑线”的问题被禁止出版,所以可以买到的《鲁迅全集》只有没有注释的白色版本。因为没有注释,鲁迅杂文里的人名、事件、团体等弄不太清楚的地方特别多,所以为了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习惯、文化背景,我就得去中文科图书室找来一套1958年版《鲁迅全集》看看。但是最难的还是鲁迅的文章本身,我不得不承认以本科生的汉语阅读能力阅读鲁迅实在困难。我拿着那本快被我翻烂了的《新华字典》向没有注释的白皮的《鲁迅全集》中的文章进攻,就像吉诃德那样开始英勇突击,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辞典,学习、攻读了一遍。

当我要写本科生毕业论文时,最感兴趣的是1932年的“文艺大众化”论争,我当然可以选择以鲁迅为中心论述。但是对我来说,鲁迅还是像吃了黄连似的板着脸孔、性情怪僻,揣着匕首进行激烈批评的形象,所以我尽可能地不直接写鲁迅,最后决定以瞿秋白为主题进行了论述。论文的成果我在这儿就不提了,但考上硕士研究生以后我回避鲁迅的怪毛病并没有改掉,还一直延续下去,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许地山(落花生)》。那时我努力把他写的文章都收集起来,包括在杂志、报纸上写的评论等,精读过以后才完成了硕士论文。研究的成

果也不在这儿再提了,可我知道老师的评价并不高。

后来幸亏有机会在水户的茨城大学任教,才改变了我的人生。当地的北边有一座瑞龙山,整个山上都是水户德川家世世代代的坟墓。他家众多豪华的坟墓的最里边有明遗臣朱舜水的一座小小的坟墓。他在江户时期逃到日本,受到德川光圀的邀请,传播儒教。我在那儿任教时正值中日文化交流刚刚开始,有些中国大学来的客人希望去朱的坟墓祭拜,我每次都陪他们去。众所周知,这座坟墓与鲁迅有密切关系。鲁迅留日时在去仙台的路上,途中顺便拜谒了朱舜水墓。现在也还不能完全证明他的这次拜谒是不是属实,不过在《藤野先生》中鲁迅自己曾写过这一经历。虽然水户跟鲁迅有非常深厚的关系,可是我好像是武田泰淳随笔《L恐惧症》(这里的“L”即是鲁迅)中的主人公似的,还是继续坚持避开鲁迅的态度。

在那时我了解自己之所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大概是因为对民国时期对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矛盾心态知识分子有认同。许地山就是这类人中的重要人物,当然,在这一框架下,更应当把鲁迅包含在内进行研究分析,可是当时我并没有论及他。

我第一次正面谈及鲁迅的文章是一篇比较《一件小事》与《无题》这两篇短文的论文,是在1990年写的,那年我已经38岁了。有位老师指出这只不过是个极其微小的问题,可我却在极其微小的地方发现了一些微妙的区别。在那以后我心里才萌发出要把鲁迅的文章作为分析对象进行详细文本分析的愿望。我诚惶诚恐地一步一步迈向研究鲁迅的道路。那时我受到了欧美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还受到了汪晖的《反抗绝望》和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两篇文章的启发,终于在1992年完成了一篇名为《鲁迅小说里的对话性和世界认识》的论文。当时,有位老师指出:“这个问题过于庞大,只用26页说明不了,而且还有很多理论上的术语很难理解。”可



挤去,每个人都在努力推开别人伸手去抢夺饭菜。看样子大家好像在大叫大嚷地互相叫骂,可是我却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眼前的场景是乱七八糟的,但耳朵里却非常安静、没有任何声音,所有的东西是黑白色,没有任何色彩。

这时又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而眼前再次出现浓雾,什么也看不清楚,我只得闭上了眼睛。可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突然发现我面前站着一位老人。他个子不高,穿着破落的长衫,板着的脸上留着黑白胡须,眼睛炯炯有神。我看着他的容颜,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看着我,热情地对我微笑,并挥手让我坐到长凳的凳子上,他也坐在凳子的另一方。我忽然想起来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他不就是那位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吗?我那时觉得,不管这里是天堂还是地狱,能碰见鲁迅实在兴奋,所以我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问了他很多关于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可是他对我的提问却是毫不理会,而是板起了面孔开始对我滔滔不绝地数教起来,只是他讲得太快,他的说法有时像斥骂,有时像诉苦,有时像请求,我听来就好像叽哩咕噜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完全没有了开口的余地。虽然我听得见他说话的声音,可是却听不懂他的浙江方言。过了一会儿,他看着我不能理解的样子,变得很焦急,语速也越来越快,声音则大起来了。我耳边听到的满是浙江方言,其意思却一丝也没弄懂。鲁迅看着我,突然闭上了口,并

沉默了下来。那一定是因为“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吧。这时再次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眼前又像下了浓雾一样看不清楚。我再次闭上了眼睛,可这次睁开眼时,鲁迅却已经不见了。他可能觉得对我讲也是白费,所以就走了。我只能一个人孤坐在那张长长的凳子上。看着乱七八糟的场景,耳边却是一片安静,没有任何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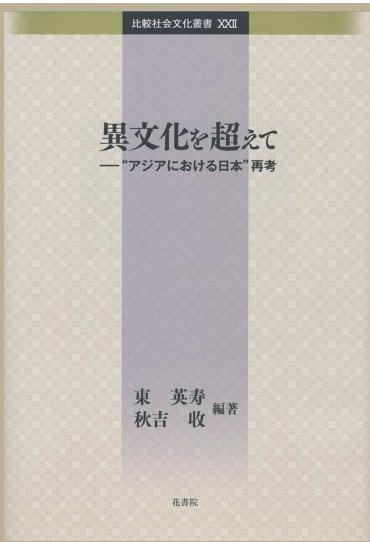
又刮起了大风,尘土飞扬,眼前浓雾弥漫看什么也看不清楚,周围还是黑白色的世界,没有其他色彩。我又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从睡梦中醒了过来,才发现在梦中遇到了鲁迅。我能清楚地记得鲁迅的容貌,和他拼命对我讲话的姿态,虽然我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我很后悔因听不懂他讲的意思让他走掉,这样不是再也没有机会直接与他面谈了吗?在这个梦里我一句话也没说出口来,而鲁迅讲的一句话我都没听懂。可是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为他的方言和我听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思维与鲁迅要讲的内容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起床以后,我下定决心,为了能听懂鲁迅的话,我应该了解他拼命要讲的内容。所以我要阅读《鲁迅全集》,研究分析他的文章,这样也许才能够理解梦中的鲁迅。我的鲁迅研究就是由这样的缘分开始的,至今我仍然是在诚惶恐地一步一步地小心前进。

后来我写了几篇以文本分析的方法来理解鲁迅小说的论文。写完10篇以后,我想可以汇集成书出版,于是就出版了一本名为《读解鲁迅——解谜与不可思议的小说10篇》的专著。这本书可以说是代替那个在梦中没能说话的我向鲁迅的告白。虽然我不知道鲁迅如何评价,但对于这本书学界前辈们评价似乎并不高,他们说:“你的意思不明确。”可是没想到有一位年青学者夸赞道:“文体像爵士乐一样,可惜音量还不够。”

现在我还是觉得需要对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思想进行整理分析。可是因为我的能力有限,才写了两三篇,我还要再接再厉继续研究写下去。我写论文的动机就是为了能倾听梦中鲁迅要告诉我的话,因为我觉得那梦中的话可能是他晚年的苦衷。

我自己已经过了花甲之年,比鲁迅活得还要长。年纪大了,就像鲁迅写的《死》里的那样,我的思维越来越激烈。在向年轻人介绍他时,我更希望不要夸张他黑暗的一面,虽然这一面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读鲁迅的魅力。可是向现代人介绍鲁迅时,我觉得描述出其温暖的、希望治愈大家的鲁迅的一面更好,因为这也的确是他面貌的一部分。因此我希望尝试阅读鲁迅,了解他怎样治愈很多精神上受到重创的人,用这样的观点来分析他的文章和生平,尽管鲁迅可能并不希望后世有这样的评价。但我最后想说,不论何时,不管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希望再有机会见到鲁迅。那时候我将怀抱自己那些肤浅的论文与著作让他过目。对于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社会、当时的中国与日本社会、当时的鲁迅研究,跟鲁迅敞开心扉地谈上一宿。惟一让我担心的就是那时的我不知能否理解他的方言?

(作者为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与周作人的回想“(豫才)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1936年《关于鲁迅之二》)所阐述的不同,实际上鲁迅和日本现代文学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最近的拙稿《鲁迅和佐藤春夫——以散文诗集〈野草〉为中心》(2013年、《东方学126辑》)着眼于大木雄三(日本作家,1895—1963)的短篇《大地的呻吟》(刊载于1919年11月《中央文学》),它的开头和结尾如下:

原来是一个梦。此前一直为那紧张透顶的事情而拼命挣扎的自己,原来是一个梦。那竟然是一个梦,我总觉得实在太可惜了。其实,现在的我完全有可能遇见那样的情境,这个梦未免有些过于真实。——于是乎,我感到脑袋周围格外难受,想用手拂开——我的意识从这时开始渐渐苏醒过来。原来是被襟从头上重重地、沉沉地滑落到脸上去。

这篇文章以梦为依托,从个人的感受写起,和鲁迅《野草》中的《颓败线的颤动》(1925年7月13日《语丝》35期)的写法十分相似。

我梦见自己在做梦。自身不知所在,眼前却有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但也看见屋上瓦松的茂密的森林。……我梦魇了,自己却知道是因为将手搁在胸脯上了的缘故;我梦中还用尽平生之力,要将这十分沉重的手移开。

开头“梦”的双关意思,和其醒来方式的奇异,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些是鲁迅《野草》的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一点让人感兴趣的是,与大木雄三的《大地的呻吟》一同刊载于该期《中央文学》的还有佐藤春夫的《我之窗》,其中的描写和《野草》中的《墓碣文》《一觉》等文章的描写十分相似,由此可见,鲁迅在执笔《野草》之际翻阅了日本的这一杂志的可能性很大。佐藤春夫1932年最初在日本主要的文艺杂志上翻译介绍鲁迅作品(《故乡》),1935年负责由最有影响力的岩波文库出版《鲁迅选集》等,为日本的鲁迅研究奠定了基础。拙稿通过考察历来研究中未曾涉及的鲁迅和佐藤春夫的深层关系,揭示二人在文学上接触的奥秘。

到目前为止,有关鲁迅的研究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鲁迅活跃当时中国文坛对鲁迅文学,特别是对《野草》形成的影响。其二,鲁迅批中国现代文学与台湾现代文学的关系。其三,海外文学,尤其是日本现代文学与《野草》的关系。

现代文学与鲁迅文学,特别是与《野草》的关系。最近,我主要以日本现代文学和《野草》的关系为中心进行研究。

1902~1911年对鲁迅来说是复杂、多感的几年。这期间他留学日本,他文学的形成也源于此。拙稿《鲁迅〈野草〉之芥川龙之介》(2000年,《日本中国学会报》52集)以《现代日本小说集》(佐藤春夫的作品也收录其中)所收录的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是散文诗集《野草》的直接创作来源这一事实的发现为线索,尝试探索了鲁迅的《野草》观、诗精神。随着研究的进展,我渐渐地感觉到日本(文学)对鲁迅文学的影响比预想的更加深刻。《芥川龙之介全集》共有24卷(1994年,岩波书店)《佐藤春夫全集》共有38卷(1998~2001年,京都临川书店),如此之多,如果要进行翻阅、比较跟鲁迅有关的所有日本文学,这对于日本以外的研究者大概是不易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留给日本研究者的空间可能还小呢。有关鲁迅和日本文学的关系,笔者还发表过《鲁迅的〈野草〉与谢野晶子的〈野草〉——围绕〈晨报副刊〉刊登的诗》等约20篇论文。另外,还有探讨西方文学和鲁迅的关系的(1995年,《鲁迅与屠格涅夫》、2009年《从鲁迅〈野草〉看泰戈尔、徐志摩的影响》等),鲁迅和台湾现代文学的关系(2007年,《赖和与徐玉诺——“台湾的鲁迅”与大陆新文学的关系》等),以及其他研究。此外,笔者也从事鲁迅的周边事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品、相关资料的翻译介绍等工作。

我最初立志于鲁迅研究是因为在九州大学中文系毕业时的论文是有关清末小说的研究,在那期间我仔细阅读了《中国小说史略》。1998年在县立高知女子大学任教时,我得到了向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丸尾常喜教授(1937~2008年,主要著作:《鲁迅〈人〉与〈鬼〉的纠葛》)学习讨教的机会,受到丸尾先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启发,决定缜密详尽地研究《野草》。同时期我也受到了丸山升教授、藤井省三教授的直接指导。

日本的鲁迅研究经历了世代交替,面临着学术多样化下呈现的各种状况,也受到政治上的中日关系复杂性的影响。但是,我希望通过继承竹内好、武田泰淳、丸山升等前辈对日本军国主义和对亚洲侵略的深刻认识、反省,使得对鲁迅的研究更加深刻,也希望通过这些研究使我们重新认识到鲁迅及其文学。因为鲁迅无论对哪个年代的人,都有共通的指引力量。

(作者秋吉收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语言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距离我首次发表有关鲁迅的论文《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试论》已经过了20多年了,这一时间委实不短。而长年坚持和鲁迅进行对话的研究人员、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来看,其数量一定十分庞大。即将迎来132年诞辰的鲁迅,正是现代中国所孕育的具有本土特色,同时又代表着东亚的人权、女性观、儿童观的洗礼。家道中落,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这些虽然是胡适、茅盾等现代文学家、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但鲁迅的情况却也有他的特殊性。比如,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充满正义感、刚正廉洁的官僚祖父,因生平唯一一次涉嫌舞弊的科场考官收买未遂事件,被判死刑而下狱,带给周氏家族的400年历史以“荣耀和屈辱”;

其人生。众所周知,作为清末江南绍兴名门一族的第14代而出生的鲁迅,从小在性别差距巨大的儒教社会中,亲眼目睹了在男尊女卑思想下祖母、母亲、婶婶等众多女性受役役的生存状态,度过多感的少年时期,进而在青年期受到西方近代的人权、女性观、儿童观的洗礼。家道中落,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这些虽然是胡适、茅盾等现代文学家、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历,但鲁迅的情况却也有他的特殊性。比如,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充满正义感、刚正廉洁的官僚祖父,因生平唯一一次涉嫌舞弊的科场考官收买未遂事件,被判死刑而下狱,带给周氏家族的400年历史以“荣耀和屈辱”;

年而逐渐成熟的鲁迅的思想,我们需要关注“性别”和“弱者”的观点。

受到儒教道德压迫的寡妇,集中体现了旧社会的妇女形象。围绕寡妇形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女性论和儿童论,出现了很多从社会性别角度对作家作品及思想(女性观、婚姻观)进行的分析。然而,作为男性的鲁迅,往往容易被归入“人”的问题,不易被单独从性别的角度被抽取出来,因此我们很难见到从性别的观点分析鲁迅。日本的鲁迅研究蔚为大观,仅次于中国,其分析和考察素有“细腻”之称,日文译文亦有很高的质量。然而,即便如此,日文译文还是没能准确把握鲁迅注视社会性别、有意区分使用原文词汇的意图,因此,我们从译文中无从解读到鲁迅所构建的思想。仅仅作为子孙而存在的《长明灯》的主人公“他”、没有后代的孤独者魏连殳、走向死刑的阿Q等一系列的男性形象以及其他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在这一点上,即使是在中日两国均受到高度评价的竹内好的鲁迅分析也不例外。

对“弱者”的态度,以鲁迅少年时期的个人体验(屈辱体验)和民族体验为基础而成立,并发展成为弱者更以欺负比自己弱小者而生存的对等阶级制度结构的认识(《灯下漫笔》吃人的筵席),进而鲁迅向着对压制生命的权利者进行反抗。鲁迅认识到,“被杀掉”的文学者的使命是以自身命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追求生命的坚强意志,并对统治阶级发起永无休止的战斗。因此,鲁迅战斗者、反抗者、抵抗者的生存方式逐渐走向成熟。鲁迅在晚年看重和注视的是以母爱为代表的无私的“爱”的力量。坚持与压制民众的社会权力对峙、抵抗和反抗的鲁迅思想,追求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和爱之力量的思想,与旨在实现民众时代的现代民主主义“Multitude”论从根本上是相通的。鲁迅一直在关注的社会性别,到今天仍是需要解决的现代社会的课题。现代社会仍未解决的社会性别问题带来的压迫,追求民众的生存与发展的民众思想,是鲁迅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向现代社会的我们所发出的信息,是面向近代中国、东亚、世界乃至人类的未来所发出的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质问和课题。鲁迅追求“平民”世界的到来,今后我将带着鲁迅所发出的质问和课题,继续跨越时空与他开展热烈的对话。

(作者为日本成蹊大学教授)

另一种“鲁迅”形象

——通过鲁迅“生与性”的轨迹开拓鲁迅研究的新境地

□[日]汤山美子



奇和感动。本稿将介绍本人作为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之一,所看到并希望在今后继续关注的鲁迅研究课题和本人与鲁迅开展的“对话”,并揭示其中一二。不论在哪个时代,人都是在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接点之上,构建自身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构成鲁迅文学与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鲁迅将“时代与社会”的发展步伐最大限度地纳入到自身生命之中,从中发现“个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他将“时代与社会”这一“公”的世界与“私”人这一个体生命连为一体,如同一股绳捻在一起,谱写出文学和思想。

“时代与社会”被鲁迅纳入自身生命中,时而对峙、时而对话。在与“时代与社会”的碰撞中,对他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其在故乡绍兴的周氏家族所经历的家族成员的男女老少的境遇及

“辱”;虽然开明而民主,但因纳妾问题饱受儒教社会辛酸之苦的祖父的续弦妻子——祖母;早年失去文弱的丈夫,在大家族的压力下养育长子鲁迅等三个儿子的坚强而慈爱的母亲;因对母亲的爱而无奈接受的“母亲的媳妇”朱安以及鲁迅与朱安之间无性婚姻等都对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鲁迅摆脱“母亲之子”的束缚,作为一名男性恢复自身“性”并定立“生”是在45岁,就是跟许广平一起南下后才实现的,这时留给他的人生仅剩最后的10年了。

鲁迅迟到的后半生迎来了“性与生”的转变,而其背后是从3·18杀戮事件到4·12白色恐怖、动荡血腥的中国现代史。在对抗和反对统治阶级的民众运动中,一个勇敢拿起笔杆子进行抗争的杂文的时代应运而生,这是为不识字的平民开创木刻艺术运动的时代。为解读贯穿鲁迅生平、晚

(作者为日本成蹊大学教授)